



盛世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长安古意》卢照邻



长安回望绣成堆
参考自长安里坊平面图以及
西安博物院复原沙盘模型



首都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受隋恭帝禅位登基为帝，国号谓唐，建元武德，改隋朝都城“大兴”为“长安”，唐王朝近三百年的传奇就此起步。

长安城原名“大兴”，是隋文帝杨坚设计建立的一座巨型城池。杨坚希望这座新城能“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隋书》本纪第一 唐·魏征），特发十万民夫筑城，后经唐代两次扩建，面积约84平方公里，人口百万以上。

新建成的长安经过精心设计，布局与过去杂乱不堪的城池相反，有着非常清晰的功能分区，分别是宫殿区、官署区、居民区。

城市正北为太极宫，太极宫的东北侧是大明宫，城市东侧另有兴庆宫，三处相连，构成了皇帝与嫔妃们居住的宫殿区。太极宫南侧为官署区，三省六部统一安排在这片区域，北接皇宫，东西墙从皇城延伸，南面开含光、朱雀、安上三门，出入需有“门籍”，一般居民不能入内。剩余超过城市面积80%的部分就是普通市民居住的区域，被笔直整齐的道路分割成棋盘式布局。长安城有南北向街道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将居民居住区切分成100余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区域，这样划分出来的区域就是“坊”，四周建有坊墙，墙上有坊门，每天入夜之后坊门关闭，

不得随意进出。

长安城中的“坊”情况各有不同。王公贵族的深宅大院集中在城东兴庆宫附近，再往南便是教坊名伎居住的平康坊，城西多是富商巨贾，城南则是普通百姓，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胡人则聚居在城市西北角。城东和城西各有一处“市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市、西市，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商人聚集在这里。

坊市结构整齐又易于管理，不仅成为唐代大都市的标准布局，也深深影响了周边邻国的城市设计与发展。



商业

大唐社会安定富足，百姓家有余粮，商业贸易迈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长安城中设东市、西市两处固定市场，各占两坊之地，“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次南东市》北宋·宋敏求）。来自全国各地乃至西域诸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交易买卖。

唐代关于商业监管有一套完善的体系，尚书省户部下设金部和两京诸市署，负责监管市场，唐律中针对强买强卖、哄抬物价、欺骗买家、制贩假货等罪行处杖刑八十，按盗窃罪严惩。朝廷还会经常派官员前往各地评定物价，以防波动剧烈破坏市场，若官

员未能公正监管评定物价，同样要按盗窃治罪。如此一来，唐代市场井然有序，商业活动也愈发繁荣。

在唐代的商业体系中，对外贸易是十分特殊又重要的一环。西域胡商赶着驼队将域外所产的香料、药材、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送入大唐国门，又将大唐丰饶的物产运往他乡。以香料为例，唐代市面上售卖的只有少量产自本土，如麝香、甲香、沉香等。更多的香料则是“进口商品”，一部分通过“朝贡”的形式向外国使节购取，另一部分来自南洋诸岛，由阿拉伯商人经“海上丝绸之路”运送至广州、扬州等沿海口岸再行分销。沉香、郁金、婆律膏、龙脑、苏合香、安息



胡商
参考自大英博物馆藏胡商俑、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胡人抱包袱俑

香、乳香、没药都出自胡商之手。最多时，广州一城便有十数万胡商及家人居住，他们在市场内设有香行，专营香料买卖，除供应达官贵人日用之外，也承办宫中所需香料。

有趣的是，唐代还有专做商人生意的商人。有代人保管钱物的托管商“柜坊”；还有“飞钱”，只需一张薄薄的凭证便可在其他城市提取寄存的货款，这正是后世钱庄、银行的前身。



工艺

大量的财富和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政府设置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体系，用官奴婢、犯人、徭役征调来的民夫和工匠来维持运作。民间有大量以手工业为生的专业工匠，同时出现了作坊，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

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皿便能看出唐代金银冶炼技术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唐人在加工金银器之前先将金银提纯，所用“灰吹法”与现代工艺异曲同工。此时“锤揲法”日益流行，工匠将金银原料放在砥石粉和松香拌成的柔软底座上反复

敲打，使其延展变形为所需要的形状。再辅以雕刻、焊接、镶嵌等成熟的技法与域外传入的纹样器型相结合，造就了唐代金银器艺术的辉煌。

纺织业是唐代的支柱产业之一，织法、纹样、产量、规模都远胜前代。灵活自由的纬线起花法替代了经线起花法，织锦图案的丰富程度很快便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织工会将鸟、兽、花草、人物、文字、吉祥图案等融入织锦中，花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域外文化孕育出了许多新图样，比如唐代极为流行的“连珠纹”，就是参考了波斯

萨珊王朝的设计，由一圈小圆点组成圆环，环内有鸳鸯、对鹿等主花，十分新奇美观。胡人狩猎、域外奇兽也是唐代纺织品常见的主题。精美的纺织品是大唐最为重要的出口货物之一。

唐代也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匠人在陶瓷釉药中混入铁、钴、铜、锰等金属，调配出了黄、赭、白、绿、蓝等各种釉色，将几种颜色同时用在一件陶器上烧制，出窑之后便是绚丽斑斓的“唐三彩”，其工艺达到了低温釉陶技法的巅峰。



教育

我们熟悉的“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成熟于唐代，用统一考试的方式从民间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进入政治管理机构之中任职。朝廷为了培养更多有用之才，百姓为了获得更多的任职机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

唐代科举制度细分下来有若干种不同的情形。考试科目繁杂多样，有数十种之多。大多数选拔的是书法、法律、算学、史学、道学、礼法等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另设明经、进士两种通才考试，尤为世人所重。“明经”考的是学生的记忆力，考时将书中

原文用纸贴去部分，令考生默写，或是阐述对四书五经的理解，难度较低，录取人数也最多。“进士”看重的是考生的文学修养，在明经科内容之外另加诗、赋，这就要求考生博览群书，文辞流畅，言之有物，因此更难考，但也更受重视。俗语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两者难易高下立判。

在各地乡野村落之间有“乡校”，粗粗教导孩童《论语》《孝经》作为启蒙教育。州县都设有官学，在长安城和洛阳城中设有国子监，学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设

有修业年限，要在限定期内通过口试与笔试方能继续学习，成绩优异者期满后可得到学校推荐去参加考试。长安城中的学生数量最多时有八千余人，其中还有来自别国的“留学生”。民间还有很多“私学”，著名的学者门下往往弟子数千，能引领文风变革。日本僧人空海曾经感叹：“大唐城，坊坊置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综艺种智院式并序》空海）正反映出了教育在唐代的普及程度。